

# 《艰难时世》与葛擂硬的学校教育

□杨 靖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重新发现了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而在此之前,《艰难时世》被绝大多数评论家视为狄更斯长篇小说中“最不重要的一部”。事实上,它也是惟一缺少作者前言的一部,因此,后世评论家对于狄更斯这部作品的起因存在诸多说法。务实派的说法是:当时狄更斯担任主编的《家常话》销量低迷,小说家希望以自己的名望促进杂志的销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艰难时世》不同于狄更斯小说以往按月连载的形式,而是按周连载。而更多批评家则倾向于认定这是揭露阶级压迫、针砭功利主义以及宣扬阶级调和的一部“政治”作品。

评论中较为引人注目是文学评论家伊瓦肖娃的观点。她在《狄更斯传》中指出:小说家所着重注意的,不是社会冲突的描写,而是葛擂硬的教育体系,以至于全书最大的反角不是资本家庞得贝(这位富翁相信“煤烟是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東西,特别是肺部”,并始终认为在他的纺织厂劳动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工作),而是给他的子女灌输了灾难性教育理念的葛擂硬——用伊瓦肖娃的话说:“狄更斯始终忠于他的信念,即人们的教育、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的思想体系,在他们后来的一切实际行动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决定个人的祸福,而且也决定整个社会阶级的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艰难时世》完全可以当作情感教育的教科书来读。

葛擂硬原是个五金批发商,退休后,成了这个地区的国会议员。他是个功利主义的信徒,他在焦煤镇创办了一所学校,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的手段,把焦煤镇的孩子们都培养成服从帖帖的小绵羊,以便将来让庞得贝这样的资本家任意剥削。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 and 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武断蛮横到极点,还自以为一贯正确。他凡事只讲“事实”,不讲其他。在他的眼里,工人并不具有人的属性,而只被看作多少匹马力,多少只“人手”(hands)。狄更斯讽刺说,如果造物主只给工人们两只手,或者像海洋的低等生物那样只给他们“手和胃”,他们一定更能够博得资产者的欢心。葛擂硬宣称他这个人的处事原则就是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他的座右铭是“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

葛擂硬不但对学校教育主张抓紧事实不放,对家庭教育更是如此。“正如他的名字(Gradgrind,有逐步碾磨的意思)的寓意一样,他抹掉了孩子的天性,扼杀了他们的情感,毁掉了他们的生活。”葛擂硬共有5个孩子,在这位异常讲究实际的父亲的“事实”教育之下,没有一个小葛擂硬听说过“月亮里的嫦娥”之类的童话故事,也没有唱过“一闪一

闪亮晶晶,挂在天空放光明”之类的儿童歌谣。他一直把他们关在屋子里,用理性和道德说教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比如当葛擂硬注意到他的孩子有一种奇怪和令人厌恶的丰富想象力、一种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时候——简单来说,即背离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良好运行所必需的完美科学理性的时候——这位经济学家、公共人物和教育家这样探寻原因:“会不会有教员或者仆人给了他们什么建议,会不会是露意莎或托马斯读了什么东西……因为从摇篮时代开始,智力就被循规蹈矩地培养出来的孩子们竟然会有这种情形……”

葛擂硬对情感和想象力有着难以言喻的鄙夷;他习惯于用数学方法测算复杂难解的情感问题。即便是女儿露意莎和他的生意伙伴庞得贝的婚事,他也要通过代数计算予以定夺。一番测算下来,他发现,在所有婚姻中,有相当比例的夫妻双方年龄相差悬殊,且3/4以上为男方年长。这一结论一方面经英格兰和威尔士搜集来的婚姻数据验证无误,另一方面由旅行家在印度、中国等地,以最好的估算方法予以证明;因而可以被认作是大多数婚姻的存在状态,符合“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依照这一推论,庞得贝和露意莎虽然年龄相差30岁,两人结合仍完全合理,婚后幸福理应以预期。然而事与愿违,葛擂硬的计算过程虽然精准,但他却忽略了婚姻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忽略了女儿自身的意愿。葛擂硬和缺少必要人生经历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一样,不具



《艰难时世》英文版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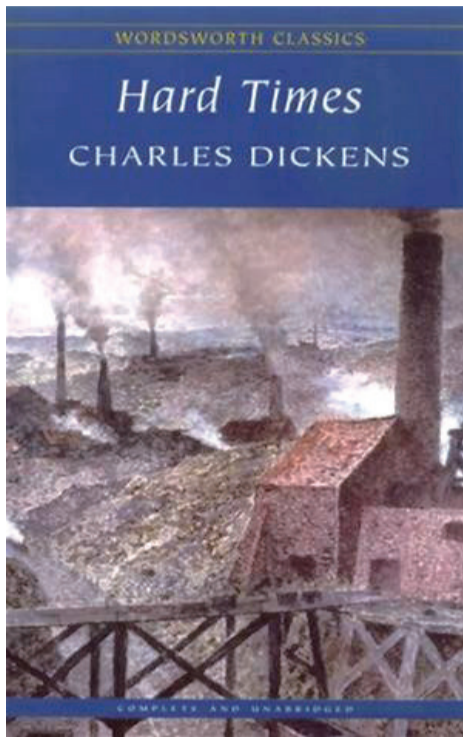
备共情和想象力,因而看不到这桩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带给露意莎的伤害。对此狄更斯不无讽刺地评论道:“要是他看到这一点,他一定会一跃跳过那些人为的障碍,这些障碍全是他在多年来自己与那些微妙的人性本质之间树立起来的。那些本质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是极巧妙的代数学所能捉摸的,而到那时候,就是代数学也要与世界同归于尽了。这些障碍是太多了,也太高了,他跳不过去。”

在狄更斯的笔下,像庞得贝和葛擂硬之类的人物都是丧失了“人性”的资产者。他们将人类情感因素排斥在外,用功利和效用衡量一切,甚至对人生苦痛哀乐也要随时进行称量,并将这一计算结果作为行为规范和最高法则;而狄更斯则相信:“人的全部就是感情”,并坚持认为“幸福并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并没有目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针对葛擂硬的功利主义教育原则和方法,狄更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好孩子”毕周这一形象使葛擂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葛擂硬最终受到严厉的惩罚与报复,可谓罪有应得。狄更斯将小说分成“播种”、“收割”、“入仓”三个部分,象征着葛擂硬推行“事实”哲学,从强行灌输、自食其果到寿终正寝的整个演变过程。

狄更斯在小说中影射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是边沁和穆勒。受洛克“白板说”的影响,边沁将不良的人性和性格比喻成杂草。杂草之所以能生长是由于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土地,而为了防止这些杂草的滋长,惟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土地上栽种花朵。至于儿童大脑这片土地能够栽种何种花朵,需要通过实验才能得知。不过,边沁强调,栽种的种类越多,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边沁看来,如果施以功利主义教育,儿童的放纵以及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性格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而节制和助人为乐(从事公益活动)的品德就会得以养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有了保证。

继边沁衣钵的穆勒本人事实上正是上述功利主义教育观的直接受害者。少年穆勒是公认的神童,在其父詹姆斯·穆勒的严格指导下,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代数、几何,到9岁时已论遍希腊史家重要著作。没有玩伴、没有嬉戏,惟有书籍与父亲的训诫。上述所有课程,还包括历史、算术以及写作,都由他父亲直接教授。穆勒回忆其受教育过程时说:“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特点是,父



《艰难时世》英文版

亲在我童年时付出巨大努力,把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知识教给我,这种知识往往要到成年时才能真正学到。公正地说,比起同代人,我早期教育的开始时间早了25年。”早熟的穆勒显然缺失了正常儿童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何况还被父亲刻意要求与其他孩童减少接触,特别是不能受学校生活的影响。像狄更斯小说中人物一样,孤独抑郁的穆勒在1826年遭遇一场精神危机,几近崩溃。两年后,因为华兹华斯诗歌的启发,穆勒逐渐走出危机——期间还有两位重要人物的影响:一位是历史哲学里渗透着浪漫主义情调的托马斯·卡莱尔,另一位是身兼浪漫主义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塞缪尔·柯勒律治。从他们那里,穆勒获得了一则重要启示,即世上存在着两种真理:一个是诗人所关注的内心世界情感的真理,一个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真理。

由此可见,理想的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有关事实的自然世界真理,更要关注内心世界情感的真理。而现实的教育环境及趣旨恰恰相反:学校并没有成为培养同情心和想象力的最佳场所,因为坚硬的事实、规则和冰冷的逻辑常常会切断教育和想象之间本然的联系。长此以往,事实、逻辑、规则等也许就成为支配和约束人们思想及其行为的第一要义,并且会强迫我们将生活变成“只有事实”“只要事实”的数字运算过程,强迫我们成为一个“只讲事实、现实,而不讲其他的人”,如狄更斯小说里的“小葛擂硬们”,他们不会想象,不会惊奇,



狄更斯

更不会做白日梦,而只能像乖巧听话的好孩子毕周那样死记硬背;马就是“四足动物,食草动物。四十颗牙,其中二十四颗是臼齿,四颗是犬齿,十二颗门牙。春天换毛,蹄子很硬,但仍需上铁掌。凭牙齿可以看出年龄”。孩子的童年被枯燥乏味的所谓智力教育所俘虏:“一把抓住头发,把他们拖进充满统计数字和客观事实的阴暗洞窟中去”。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其《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警告的那样:如今,现代化的交流和教学技术过早地杀死了儿童浪漫、活泼的天性和天真的童年生活,加速了“儿童成人化”;而卢梭在《爱弥儿》中也早已指出,要用儿童自己的生活来发展孩子们的能力,要懂得一些消极教育或延迟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事实上,过度的开发往往导致想象力的衰减。生活多姿多彩、丰富完整,孩子们的想象才会更为生动和富有情感。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的末尾描绘了一幅理想课堂的场景:“所有的儿童都喜欢她;她也学会了给孩子们喜欢的故事、歌谣等等,并讲给他们听;儿童们天真可爱的想象不应该被轻视,她极力要想了解情况不如她的人们,想法子用种种想象的优美和快乐来美化他们机械的现实生活;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们的内心就会干枯,长大成人也就会同行尸走肉差不多;如果不去陶冶天真,培养性情,即使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一个国家多么富足,但归根结底这还是大祸降临的预兆。”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美妙柔和的场景跟坚硬的社会现实恰成鲜明对比,也给后世读者留下无穷回味和想象的空间。利维斯在狄更斯所有作品中独独欣赏《艰难时世》“非凡的想象力和表现力”,盛赞其为“一件完全严肃的艺术品”,而非简单的社会批判或道德说教,可谓一语中的。

## 远藤周作《沉默》:

# 背叛中的救赎

□赵博阳

但如果故事按照这一脉络发展下去,也就徒有殉道说教的意义了,显然这并非作者想要在小说中探讨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洛特里哥的另一面,在侧隐之心的撩动下,他的内心生出了诘问。为什么上帝要将这一切迫害加在早已饱受磨难的本国百姓身上?为什么自己远在欧洲、果阿、澳门的教友同僚们得以享受温暖舒适的生活,而自己却深陷远东的泥沼之中?为什么在这一切都发生之后,上帝却没有像他曾经所学习、认识、了解的那样,展现他的大能,却对受苦的人沉默不语?在面对真正的酷刑和死亡的可能面前,洛特里哥的内心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软弱与恐惧。诚如小说中的描写,若非自己身为司祭的职责所在,恐怕也早已屈服。上帝的沉默甚至令他对他的信仰生出怀疑,但他不敢继续深思,因为一旦上帝果真不存在,那么他千辛万苦远赴日本传教,还有日本教徒的殉难牺牲,就会演变成一场闹剧。这个原先伦理上的神义论难题,此时此刻,化作现实中的真实存在,成为他的切身之痛。

吉次郎是远藤在书中塑造的一个独特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天主教徒,家人殉教之时,惟独他为活命践踏圣像,弃教逃到澳门。无意见,他帮助洛特里哥和卡尔倍偷渡到日本,重新享有光荣,即便两位神父对他白眼相待。东窗事发之时,他又像犹大那样,背叛出卖了洛特里哥。他多变、猥琐、怯懦、识时务,但在洛特里哥被捕之后,却又始终在其身边徘徊。

吉次郎的功能远非推动故事情节发展那么简单。他和卡尔倍、一藏、茂吉、莫妮卡以及弃教前的洛特里哥等人强硬又坚定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人性的软弱。远藤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强者和弱者的命题。初见吉次郎时,洛特里哥就以强者的视角相信,他绝对不会是个信徒。如前所述,天主教历史上对殉教大加赞美,故而像吉次郎这样的人,毫无例外会受到神职人员洛特里哥的蔑视、厌恶。

吉次郎在出卖洛特里哥后,仍然不离不弃,企图寻求宽恕,又多次被捕,践踏圣像弃教,如此反复,不断上演着信仰的皈依与背叛。但这一切并没有令吉次郎对信仰麻木不仁,他始

终是被罪恶感驱使着的。这个出尔反尔的悲剧人物向洛特里哥发出的高声哀叹实在震动人心:“我天生就是个软弱的人啊,我无法像个殉教的烈士那样死去!”

远藤在书中借洛特里哥之口发问:“谁又能断言弱者一定不比强者痛苦?”吉次郎就是这样一个缩影。他们被深埋在历史的尘土之下。换个角度来看,洛特里哥面对着一个悖论的特殊情境——如果他选择坚持信仰,不去践踏圣像,那么,三名信徒就会因此失去生命;但如果他选择救下他们,那就意味着不得不背弃信仰。

这也是远藤对强者与弱者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我们普通人的观念中,背叛就意味着耻辱,无论其背后的缘由为何,软弱不是获得他人原谅的借口。远藤选择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弃教者,因为他意识到了软弱是人类的真实本性。

面对内心一波接着一波的煎熬,而上帝依然默不作声时,洛特里哥陷入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故事在这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进入全书的高潮段落。洛特里哥面对着一个悖论的特殊情境——如果他选择坚持信仰,不去践踏圣像,那么,三名信徒就会因此失去生命;但如果他选择救下他们,那就意味着不得不背弃信仰。

这时,一向以强者自居的洛特里哥,内心生出了此前一直没有触及的东西——爱。为了坚持信仰而让三名信徒殉葬,恰恰是违背了爱。弃教不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最终,他选择做出牺牲个人荣誉、换回无辜生命的举动,以自我的牺牲换来爱的成全。

在远藤的笔下,洛特里哥最终做出弃教的行为是必然的结局,作者显然对这种“背叛”充满了同情和宽容,对这种“软弱”有着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使徒保罗般的勇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若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远藤对人类情感和人性注重,使得《沉默》一书具备了独特的人文关怀。

说到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很多人或许会疑惑:“他是谁?”稍了解的人会说:“哦,那个天主教作家。”的确,作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因其一系列相关的作品,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尤其是他获得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沉默》问世后,更是在日本文坛名声赫赫。

《沉默》一书讲述了17世纪的耶稣会士洛特里哥神父听闻日本幕府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恩师费雷拉神父的弃教,决心一探究竟。千辛万苦抵达日本,却因信徒告密被捕。为拯救无辜信徒,他践踏圣像弃教。在整个过程中,洛特里哥饱受人间疾苦,促使他重新思考信仰,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救赎。

16、17世纪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各地大名怀着一统天下的野心,不断混战的时代。于世界而言,16、17世纪也是地理大发现的黄金时期。葡萄牙的航海家于16世纪中叶发现了日本列岛后,日本陷入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之中。当时日本与世界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科技、风俗,不一而足。而碰撞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宗教信仰就是其中的一大矛盾。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是欧洲本土的宗教动荡。16世纪的宗教改革正如如火如荼展开,其势头之旺盛席卷了大半个欧洲。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奋起与之抵抗。“到东方去,收获灵魂”,伴随着这句著名的口号,天主教会将目光放到了欧洲以外更为广袤的世界。无数神职人员跃跃欲试,仿佛自己像牧羊人一样,对着遥远却肥美的牧场上成群的牛羊翘首以盼。他们从伊比利亚半岛启航,沿着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穿行在印度洋的汹涌波涛里,经由南亚次大陆,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远东。在这条航线上,传教士们在果阿(小说中被称为“卧亚”)、澳门等地建立起根据地,成为他们远东之行上的重要中转站。

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在《沉默》中也借主人公之口被屡屡提及,1549年8月15日,他与其他几名传教士,通过搭船的方式抵达日本,将天主教带到这个国家。继沙勿略后,更多传教士陆续到达日本,受到了各怀目的的大名们的欢迎,传教事业得以顺利开展,传教士们在日本采用自上而下、因地制宜的策略,先说服大名领受洗礼,再借由大名的权威转化其治下的民众。传教事业之迅猛令人惊讶,信徒人数逐年增加,1570年时尚不足3万人,而到了1600年时,已高达30万人。

到了丰臣秀吉时代,对天主教基本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587年驱逐西班牙传教士的《伴天连追放令》的颁布却是一个转折,为日后日本的禁教埋下了伏笔。丰臣秀吉死后,继任者德川家康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因担忧天主教的传播对幕府统治不利,德川幕府于1612